

第八章 市谷台(陆军省)

阿南陆相与终战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市谷台的陆军省，集中于为在“本土决战”与“终战”之间犹豫不定、因而苦恼不堪的阿南惟几陆军大臣的态度上。最接近于大臣的人莫过于秘书官与副官了。先从林三郎氏(当时的陆军大臣秘书官、大佐)的谈话开始。“在如此重要的时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选任为阿南先生的秘书官，因为一般说来，总是选自己比较了解的人为秘书官的，而我在部内虽知道有阿南那样的优秀军人，却从未直接交谈过。所以，突然被任命为秘书官，使我很觉意外。由于我对大臣原来就不是很熟悉，况且从大臣就任一周后发布对我的任命到终战，仅有4个月时间，所以，我关于阿南先生的谈话，就完全是我个人的极主观的印象了。

我先谈谈我对于自己被选任为秘书官的原因的想法。我1934年于陆大毕业后，立即到了满洲。1935年12月，被分配于参谋本部的俄国班。以后，做了两年左右的驻莫斯科武官助理，尔后又回到了参谋本部。在参谋本部，在俄国课由勤务而后任课长。1944年6月，由于马里亚纳惨败而进行的人事大调动时，改任第一部第三课(动员、编制、装备)课长。

在1945年4月，为准备本土决战，由于第一线参谋不足，所以决定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工作性质相似的两个部门，只任一个课长，以充实第一线的参谋人员。这样，我的第三课就与陆军省的军事课一体化了，由荒尾兴功大佐任军事课课长兼第三课课长，

我被‘挤了出来’。正在这个时候内阁有了变动，我就有可能被作为大臣秘书官的候选人。

再一个原因是此时对苏问题进展艰难，苏联于4月5日通告日本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也许因为我长期在俄国课工作，是个苏联通，而被作为大臣个人在这方面的幕僚选为秘书官的。

尽管如此，被选任秘书官还是没有想到的。自大东亚战争以来，一直在东京的军人，恐怕中央只有5、6人吧！而我则是其中之一。秘书官的工作就是跟随着大臣行动，所以我的宿舍也就在大臣官邸附近。在最后阶段，大臣官邸因被烧毁，而移至国会正门附近的高级副官的宿舍，与秘书官宿舍比邻。

在陆军省里，我记得大臣办公室旁边是次官办公室，再过去是秘书官办公室，要见大臣的人，无论如何都要经过我的办公室。作为秘书官，我十分注意绝对不在作战与人事问题上插嘴，当参谋总长和人事局长会见大臣时，我尽量回避。所以，在关键的‘近卫访苏’的问题上，阿南先生也尽可能在总理官邸的别室召集大臣们，我虽隐约听说一些，却不了解是派遣近卫去苏联访问。

我虽是苏联通，又是秘书官，然而大臣对我却绝口未提此事，可见此事的保密程度。然而，不知从何处还是透出了一星半点消息。在终战那个混乱日子开始的时候，阿南先生都较早地从陆军省回来，大约在下午4时左右就停止办公了。他时常挽着弓来到院子里，并且对我说明：‘不能认为凡弓箭都能射中靶心。倘有一、二枝中靶心，其余的箭也不能噼里啪啦一射无遗。如此这些箭矢则必然左的左、右的右，难以集中于一点。我们的心思必须要集中于那个方面。’

射箭之事大约可以表明阿南心境的安定程度。当然，我们谈阿南，是要谈阿南对于终战的态度。阿南就任大臣之时，正值美军在冲绳登陆不久，那么，阿南是准备终战而就任大臣的呢？还是如人们广泛认为的，是主张本土决战、给美军以打击之后再终战？抑或是主张战至最后一兵的彻底的本土决战论者？至少本人

从未说过‘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之类的话。所以，我自己虽有很多猜想，但很难理出头绪，我所谈的这些关于阿南的体验，也只能供诸位去判断了。”

主张本土决战的阿南陆相

“关于阿南与终战内阁的关系，即当时所流传的阿南对于铃木内阁及其总理的态度。据我的印象，阿南是很尊敬铃木总理的。这或许是尊敬作为军人的铃木总理。他常说：‘铃木君不只是海军大将，而且是伟大的海军大将！’‘铃木君是应急不乱的机智人物。’等等。在铃木内阁初期，陆海军大臣与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四人，每月有两次聚餐。当此时，为交流意见，阿南总是主张要请‘伟大的海军大将’与会，‘有海军大将的参加就更有意义了’。这虽未实现，但我想，这表达了对铃木先生，作为军人的最高敬意。

在终战时期，阿南对于总理的这种心情也在许多方面有所表现。但作为陆军大臣，无论愿意与否，都须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所以阿南常去实地视察，在视察旅行中，我了解了阿南的一些考虑，并有了若干的想法。在我随大臣到正在准备本土决战的南九州视察时，大臣发现南九州的阵地大多建在海岸的高地上，就认真地提醒当地的参谋：‘这样不行，阵地应再靠前一些。’也许还有些不放心，这天晚上还特意从宿舍喊来师团参谋长，即吉武君，（他曾是阿南任陆军省人事局长时的补任课课员）谈起了关于比阿岛的故事。这是阿南引以自豪的故事之一，他常引用此事例。当时，阿南是第二方面军的司令官。1944年5月28日，美军在新几内亚西部的比阿岛登陆，阿南指挥所属的连队反击，将美军全赶下了海。这是值得重视的战例，或许可称为‘阿南战术’——建阵地于海边，在敌人登陆的途中一鼓作气攻击之。阿南将此战术作为本土决战的基本战术加以强调。‘如果这样，美军将歇斯底里

地嚎叫着败退！’我听着大臣的说明，忖度着大臣的想法。

严格地说，陆军大臣对实地部队的作战指示，是侵犯了统帅权的，大臣当然也知道。但他所以有如此具体的指示，我想他是觉得无论如何要给敌人以一击，并以此为条件去寻求终战。无论如何！要给敌人以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是终战的大前提。”

好战情绪的由来

林三郎氏继续说：“我认为，支持着阿南这一念头的，是他的精神至上主义。诚然，即使本土作战，装备也不充足，很难与美国的物质力量相匹敌，所以阿南强调精神力量。要考察阿南的精神背景，是不能忽略平泉澄博士（原东大日本史教授）的存在的。阿南很敬重平泉。平泉办的学校大约叫‘青青社’，阿南曾给予个人的金钱上的援助，平泉也记得曾几次拜访过大臣。据平泉说，竹下正彦中佐（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内政班长、阿南的义弟）、椎崎二郎中佐（军务课员）、畑中健二少佐（军务课员）等常出入青青社。所以，我们虽不了解他们学了些什么，但看来平泉对他们是有相当影响的。

我在陆大时期（1931年到1934年）听过一、二次平泉博士的课外讲座，题目大约是山崎闇齐的朱子学。在我们之后，当饭村穰中将（终战时的东京防卫军司令）任陆大校长时，听说平泉每学期有30个课时左右的讲座。所以，陆大一部分年轻学生不仅在校时受平泉的皇国史观的感染，毕业后也受到平泉的熏陶。

年轻人为何会接受平泉的皇国史观的灌输，在考察陆军这个（将校）集团时，不能不认为是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我想谈谈自己的私见。尤其在临近终战之际，例如竹下、椎崎、畑中这些同时代的人和我们37期左右的人，或更上面的人，虽都在陆军这个共同体中，但思维方式有相当差异。就是说，竹下们的思维方式不能代表全军的思维方式。

任何社会集团，其构成都有其时代人的特性。我觉得在临近终战之际，考察一下尤其是陆军这个将校集团中的‘代’，是很重要的。在终战时，一部分陆军将校发动了政变，但不能据此认定整个陆军都反对终战，这只不过是陆军中一个时代人的思维方式。

就我来说，我是士官学校37期的学生，在那时受到裁军的影响，而且社会上按现在的说法是自由主义的倾向较强，所以士官学校里可随意读书，并可在校园里打棒球。虽说这一时代的人过于软弱，但其中也有学生队长山冈重厚(以后任林銑十郎陆相时期的整備局长)这样厉害的皇道派人物，似乎使这时代的软弱形象有所改变。

与我们相比，更前几期的一些人，即满洲事变时期活跃的花谷正、和知鹰二们又有所不同。在他们的幼年学校，士官学校任教的教官、区队长们都是17和18期的人，这些人参加过日俄战争，以后娶了贵族的师团长和军司令官的漂亮的小姐为妻子，建立了美满的家庭，这使得他们感到又羡慕、又憧憬。可是，一旦自己毕业成了将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拜金热中，军人又被冷落了。大阪北滨店铺的小伙计，瞧着军人军靴上的马刺，轻蔑地说：‘怎么穿着那样的玩艺！’对此，军人表面上虽不能强烈反击，胸中却郁愤难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郁愤，引发了满洲事变。

无论如何，经历了‘不遇的时代’的军人们，作为军人，不仅是职业，而且还具有如使命感那样的东西。他们之后是我们，我们之后就是以42期为中心的竹下、稻叶(稻叶正夫中佐)们，他们是终战时期陆军省的军务课与军事课的中坚。他们从士官学校出来前后正值满洲事变，军事逐渐地与政治同步，因而形成了没有军队便不成其为国家那样一种更强烈的使命感。

再往后在53期左右，因为是全面战争时期，士官学校的学生人数剧增、学制也大大缩短，在强化使命感教育的同时，塑造了

具有压力和行动力的理想将校形象。例如著名的辻政信，既能忍受上司的嘲弄，又能独立思考，在战争中很出色。这不就是理想将校的典型吗？在终战时期发动政变的，就是这一代人。就贬意而言，在使命感的前提下，他们不惜以下抗上，或许理想将校的形象就是这样的。

然而，那次政变的发动者们的思想，当然代表不了全体陆军的思想，这只是小部分狂热分子的冲动。我们有必要反省一下培养他们的那个时代、以及统摄他们心灵的那种纯粹的使命感……”

承诏必谨……

现在我们来听听另一人的谈话。他是在阿南陆相身边工作的陆军省次级副官小林四男治中佐。林氏从就任大臣秘书官到终战、与大臣共事仅4个月左右，而对小林氏来说，大臣作他的上司的时间是很长的，他所描述的阿南形象与林氏稍有不同。“在阿南任陆军省人事局长时，即1937年，我也在人事局工作。我与阿南不仅是局长与课员的关系，夸张地说，也可算是‘剑友’，我常常是阿南练剑的对手。

在杉山前陆相出任第一总军司令官后，我作为交接副官而留了下来。这才成为‘大臣与副官’的关系。能再度用竹刀相交，这当然是很高兴的。虽然大臣很忙，不能象以前那样常到练武场去，但我们也还是常常比剑。那件事我迄今未对人说过，那是个三伏天，当然是1945年夏天的7月底，后来一想，恰好是《波茨坦公告》发表前后。

那天和往常一样，我与大臣又进行了猛烈地格斗，双方都大汗淋漓，尔后就进了练武场的浴室。这时的浴室只有我们两人，大臣一边躺到浴盆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条件再好一些的话，就该达成和约了，虽然也许什么都得不到……这取决于条件’。

从大臣的嘴里听到关于讲和的话，至少在8月9日以前，我是第一次。我觉得很吃惊。因为陆军从上到下都忙于准备本土决战。大臣毕竟是大臣，身负陛下的厚望，着眼于大局，为顺利地讲和而殚思苦虑着，我这样想。

当8月14日最后的御前会议中，陛下最终作出了‘终战’的圣断后，阿南在这天下午，于市谷台的地下大防空壕里召集了陆军省高等官以上的课员，明确了‘承诏必谨’的意思。甚至说：‘不服者请先砍我的头！’在被召集的人员中，或许有人以为‘这违背了大臣的初衷’，并感到不满，我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认真地听着大臣的训话。那时，我从大臣的训话中感到：‘为了保存优良的民族，必须把终战看作是失败中的胜利，而决不能一败到底。陛下的心思就在于此，所以大臣体谅并服从这一圣断。’”

不在场的军务课长

当时的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永井八津次少将，从另一个方面谈到了阿南陆相处于“终战”与“本土决战”之间、进退维谷的苦恼心境。

这是指阿南陆相相对从8月14日夜到翌日凌晨发生的，由一部分陆军将校发动的政变的态度。这一政变计划，是军务课与军事课的少壮将校们制订的，实际的骚动则由军务课的椎崎中佐和畑中少佐为核心，就是说军务课长作为他们的顶头上司具有责任。然而，在这重要阶段，正好永井课长因空袭负伤在疗养，阿南陆相又没有考虑安排别人取代永井的职位，而人们则觉得阿南陆相大概早已察知了这些年轻而强硬的军务课员们的动态。阿南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许多人卷进了这一事件之中，所以，事件必然与许多人有关。1945年5月25日晚上到26日清晨的那次大轰炸，使皇居的明治宫殿起了火，并烧掉了海军省和陆相官邸，这是这次战争史上的大

事之一，我也在这次大空袭中遭了难。在这天白天，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有心人在上野的‘精养轩’招待了德国武官。由于5月7日德国的投降，德国驻日大使馆的一伙都非常消沉。有个武官，大约名叫库埃奇梅尔的，也许为了安慰他，所以请他吃饭。宴会结束时已傍晚了，无法回陆军省，所以就回到了当时租用的市谷站附近的茨城县人会的宿舍。

由于喝了酒，大家正酣睡着，刚休息一会儿，大空袭开始了，当我奔出门外时，正好头顶上炸开了一个燃烧弹，果冻似的燃烧剂扑头盖脸而来，使我全身严重烧伤。半生不死中逃回了九段的偕行社。附近的宪兵司令部的军医，为我作了简单的医疗处理。第二天一早送入了牛込的陆军医院，大约疗养了1个月左右时间，又转到箱根汤本的吉池旅馆(这里是陆军疗养所)疗养。这期间，阿南先生特意为我派来他的大臣专用车，阿南先生是很懂得关心人的。

8月6日，广岛落下了原子弹。看了迟来的报告，不单感到事态的极端严重，而且还听到陆军省传来的一片责难声：‘广岛第二总军的参谋们，虽然挨炸仍坚持指挥，在这非常时期身居军务课长要职的永井少将，仅因燃烧弹的攻击，就疗养了两个多月，这是为什么？’这是课员田岛俊康少佐10号来接我时得知的，但我问心无愧。尽管如此，军务课长处于军政的核心地位，一般说来，在这问题堆积如山的时期，我一倒，必然要很快地任命新课长，但阿南没有这么做。在我离开东京去疗养的期间，军务课长就这么为我空着，这是什么道理呢？只是在我不在期间，由军务课的高级课员种村佐孝大佐(《大本营机密日志》的作者)代理我的职务，由竹下正彦中佐协助。

这里插上一句，1945年4月，为准备本土决战，因为前线军队参谋不足，所以试图通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一体化调剂出一些人员，作为参谋充实部队。在这次机构改革中，陆军省的军务课与参谋本部的战争指导班合并，所以种村君到我这儿来了，我

也兼任军务课长和参谋本部第12课课长，此后陆军省的人们，也带着参谋徽章。

我不在时仍给我留着军务课长的位置，使我感到有些振奋。据我推测，阿南先生最后还想用我，这是有理由的。4月份，铃木内阁成立的时候，陆军对铃木总理提出了所谓的三条件：

- 一、彻底完成战争的目的；
- 二、为本土决战充实防卫战备；
- 三、努力使陆海军统一。

如果不答应这三个条件，陆军将不协助组阁，就是说要使铃木内阁流产。有说这是对铃木总理的粗暴干涉。其实，当时的陆军内部也不一致。所以，实际上铃木先生漠然处之，也没什么事。

而这些条件是有相当的伸缩余地。因为这些条件是我们军务课起草的。是在与杉山陆相商量后，在我的指示下，由军务课员白井正辰中佐和另一人起草的。仔细一看就清楚，第一个条件是‘彻底完成战争的目的’，就是说不是结束‘战争’，而是完成‘战争目的’。

当时，关于这三个条件，与入阁的阿南先生谈了，并得到了他的同意，柴山次官也是同样的意见。大臣与次官当然都不会明确地说这里包含着讲和的意思，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两人显然对讲和都是极关心的，只是在表面上，必须说本土决战，既使用竹矛也要战斗，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气氛与准备。很明显，战争目的是达不到了。我想，正因为有这样的内情，在铃木内阁开始行动时，阿南先生打算最终要用我，所以仍承认我是军务课长。”

阿南陆相的内心

永井八津次氏继续说：“条件的第一条是要实现战争的目的，

为此就要彻底地实行战时体制，假如美军要登陆就必须如此。击败美军之后，才有了讲和的必要。所以，他虽然在心中盘算着讲和的事，却仍然推行着战时体制，继续准备着本土决战。可是，5月7日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使人顿感沮丧。德国的失败虽在预料之中，但总抱着侥幸的心理，现在严酷的现实来临了。客观的形势表明，这时日本的讲和，就只能是无条件的投降。如果是无条件投降，陛下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极而言之，也许陛下将被缚着拉下宝座。‘即使那样，你们也无条件投降吗？’大臣极痛苦地说。如果说‘即使那样也投降！’这是何等狂热的讲和论者哟。我们谈到了阿南对于讲和的考虑，但在那样的情况下，大臣是难以决断的。当时，在陆军内部倾向讲和的，我也是其中一人。而态度更明确的，则有铃木总理的秘书官松谷诚大佐，还有参谋本部的通讯课长仲野好雄大佐等，这些人我都很熟悉，在会议上一说起这些话，就集中到讲和能否保障天皇、即能否维持国体这一问题上。一谈到这些问题，大家都默默无语。如果统帅部和政府决定讲和，天皇陛下即使认可，谁也难以断定这对天皇自身绝对无碍，对国体也无碍。天皇怎么样、国体怎么样？心中无数，谁又能决定终战呢？阿南到最后所以下不了决心就在于此。

我十分了解阿南的心情。其实，在我感受最深的年纪里，在幼年的学校时期，那时的学监就是阿南大尉，在我开始懂事时，就受到了阿南的教诲。以后阿南做次官的时期，我也在陆军省，得到了许多照顾。我确信，我了解阿南的心情，阿南也理解我的思想。正因为这样，才给疗养中的我仍然留着军务课长的要职，对我寄以期望。因此，我没有完全满足这一期望，也许应该感到歉意。”